

且談毛共「批孔」

尹慶耀

孔子，這一代聖哲、萬世師表、中華文化的培育人，自從「五四」以來，就屢遭抨擊、侮罵，這象徵着不肖子孫對自己的民族文化失掉信心，於孔子何傷！

當毛共高喊破四舊、立四新，以「造反奪權」手法大搞文化大革命時，若干西方人士，偏把毛澤東思想和儒家思想拉扯上關係，甚至把大陸上的讀「毛語錄」，比做儒家的誦讀經書；而蘇聯更別有用心地想把毛澤東的一隻腳拉進孔廟的大門，這象徵着他們絲毫不懂得中華文化，於孔子何傷！

毛澤東在幾「革」幾「反」之後，「舊」不能「破」，「新」不能「立」，他的「革命路線」處處碰壁，路路不通，竟想「刨根問底」，打起「批孔」的招牌衝出重圍，那象徵着他已黔驢技窮，於孔子何傷！

批孔的政治鬥爭，正在各個方面展開」。這是毛共官方的說明。

由以上二者看來，「批孔」乃是由毛澤東親自策劃和領導的，而不是次級階層尋常的派系鬥爭。

「批孔」不像馮友蘭所說僅限於「中國哲學史領域內」（他是以哲學教授的立場才那樣說的），而是在政治思想、歷史意識乃至教育、文藝、音樂、電影、戲劇……：各方面同時進行，那正是毛共報刊所經常鼓吹的上層建築領域內、意識形態領域內的「徹底革命」，是一場文化革命。其目的，是要大家「滿懷熱忱地支持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要通過批林批孔建設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

共黨的任何運動都有其現實的意義，把「批孔」和「批林」拉扯在一起，那就像「人民日報」所說，是一場現實的「政治鬥爭」。共黨的政治是階級政治，在黨內就反映為路線鬥爭。毛澤東主張的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路線，偏僻或落後於這條路線，都將被視為修正、復辟、反動、叛徒，這些正是毛共目前為林彪定製的帽徽。「人民日報」說：「……批孔

目前，「批孔」運動正在中國大陸普遍深入，如火如荼地展開。有人說這是毛共新的文化革命的開端，有人說這是毛共（舊）文化革命進入第二段。我們得說，這些看法都有道理。

去（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年近八十的哲學教授馮友蘭，在他「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一文最末一段裏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向縱深發展。在中國哲學史領域內，正經歷一場新的革命。毛××親自領導，指示方向」①。馮友蘭的文章，自然是共黨授意他寫的，完稿後還必須經共幹審閱才能發表，因此，他那幾句話是值得注意的。

今年二月二日，「人民日報」社論，以「把批林批孔的鬥爭進行到底」為題，一開頭就說明在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下，一場羣衆性的深入批林

確是批林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挖林彪修正主義的老根，是爲了更好地批林。批林批孔是我國當前的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它說：「在批林批孔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是積極還是消極，對每一個領導者都是一個考驗」。並且要求：「要聯繫現實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堅持革命，反對倒退……」。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原本是要鞏固他的無產階級專政，防止他的政權變色。爲此，他打倒了黨內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用「五·七」幹校去改造幹部，用上山下鄉以鍛鍊青年。誰知，他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彪，却有着「……：迫不及待地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野心，把復辟資本主義作爲萬事中最最大的一件事」。並且「攻擊『五·七』道路，污蔑幹部下放勞動」等於「變相勞改」，妄圖破壞毛××制定的反修防修，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偉大戰略部署」②。

從毛共報刊連篇累牘的文章看來，毛澤東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除了把劉少奇一夥當權派打倒（鄧小平却又復出了）外，談不到什麼「勝利」；而且，他的副手、親密戰友、接班人林彪也揭起反旗，那真是變生肘腋，還談什麼「團結」！他在上層建築領域內的陣地不曾鞏固，各項「戰略部署」遭到破壞，沒有什麼政策獲得成功。那麼他要來一次新的文化大革命，確也不足爲奇！

標語、口號、大字報、示威，又出現在街頭巷尾，從大學到幼稚園，從城市到農村，從工人到農民，批林批孔全面展開。它又是以羣衆運動的形式出現。有些學校又停課鬧革命；店員、郵差、旅館的職員，放下工作來畫宣傳畫，都民兵似乎接了紅衛兵的棒，某些地區有武鬥；蘇聯的外交官被逐，排外宣傳又見抬頭，電台的英語教學節目也已停播。一切跡象使人回憶到一九六六年的情景。說它是新的文化大革命，實無不可。

不過，領導人未變，路線與目標未變，說它是文化革命的深入展開或者說是進入第二階段，似乎更爲恰當。

二

所謂文化大革命，當然應從文化方面入手。過去，共黨對於固有文化，主

張批判地繼承，那也合乎辯證法「揚棄」的原理。因此，即使共黨內部的知識份子，除極少數例外，對於孔子思想大都褒多於貶，把它看成是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③。

毛澤東本人也是如此。一九三八年十月，他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報告說：「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④。這些話是講得早一些，但直到毛政權成立後將近九年的一九五八年，毛澤東還說過：「孔子青年時也沒有甚麼地位，……：但他學了很多本領」⑤。這話裏也並沒有貶抑的意味。

毛澤東的「三面紅旗」政策，給中國大陸人民帶來嚴重的災害，也使其黨內幹部對他失掉信心。在當時當權派的領導下，於一九六一、六二年在濟南召開兩次「孔子討論會」。而黨內的知識份子如彭真翼下的「三家村」黑店，更常以儒家思想借古諷今，指桑罵槐的抨擊毛澤東，他自然懷恨在心。不過，就在一九六四年時，他談教育就說：「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孔子教學生的課程只有六門：禮、樂、射、御、書、數。就這樣教出了顏回、曾子、……：四大賢人」。他談下放就說：「孔夫子出身於貧農，放過羊，也沒有進過中學、大學，是個吹鼓手，他什麼都幹過，人家死了，他給人家吹吹打打，也可能做過會計，會彈琴趕車，騎馬射箭，『御』是駕車，就是當汽車司機。教出了顏回、曾子等七十二賢人，有弟子三千。他自小由羣衆中來，了解一些羣衆的疾苦。……：孔夫子的傳統不要丟了」⑥。這些話雖不能說是厚古薄今，但至少有些藉「古已有之」來爲自己的主張助勢的味道。當談到哲學問題時，毛澤東說：「孔子講『仁者人也，仁者愛人』，愛什麼？所有的人？沒那回事。愛剝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剝削者的一部分。不然爲什麼孔夫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愛他們，要他們團結。可是鬧到絕糧，『君子固窮』，幾乎送了一條命。巨人要殺他。……：『詩經』大部分是風詩，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賢聖。……：『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廬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

就是從這裏來的。這是怨天、反對統治者的詩。孔夫子也相當民主，男女戀愛的詩他也收^⑦。這些話對於孔子，也只能說是毀譽參半。迨至一九六六年進入文革期、高喊破四舊時，對於孔子的態度也就有所轉變。一九六七年一月，「人民日報」刊載了兩篇由「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組織」署名攻擊「孔子討論會」（見前）的文章，點名批判馮友蘭、呂振羽等十幾名著名學者，而組織這項「牛鬼蛇神向黨進攻的黑會」的後台和導演——毛共文化總管周揚日後的垮台，也與此有關。

紅衛兵造反式的文化大革命，既不能摧毀中國的固有文化，也就不能樹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文化，於是毛共就用得着馮友蘭那句「刨根問底」的話，乾脆對孔子思想來一次全面否定了。目前的「批孔」運動的火把，是由在學術上並無地位、但一向全面否定孔子的毛共廣州中山大學教授楊榮國的兩篇文章（一九七二年在「紅旗」雜誌第十二期發表的「春秋戰國時期思想領域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從儒法論爭看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變革」和一九七三年八月三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度的思想家」）所重燃。這就顯示了這次「批孔」運動的特徵，但也反映了過去文革、批孔的失敗。

三

馮友蘭所說：「在中國哲學史領域內，正經歷一場新的革命」，也是事實。他的「中國哲學史」，已在毛共壓迫下經過多次修改，最近的一版「中國哲學史新編」係一九六二年出版，那仍在文革以前。據他在「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一文裏的自述，一九五八年他以講「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為名，提出所謂「抽象繼承法」以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法相對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雖然對於抽象繼承法作了一些表面上的批判，但他的「剝削階級的立場」沒有改變。在他寫「中國哲學史新編」的時候，用的還是抽象繼承法，特別是在講孔子的時候。他又說：「在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我逐漸了解列寧所說的『真理是具體的』這個教導的意義」。於是他把孔子所講的「德」和「禮」，都加上階級的烙印。這正是當前毛共對中國哲學乃至一切固有文化衡量與批判的標準尺度。

在這種尺度的繩範下，他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又要遭受斧鋸之災了。因此，他在上述文章的結尾說：「我決心照着毛××的指示，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改造世界觀，修改『中國哲學史新編』已出版的部分，完成尚未寫出的部分，……」。這位風燭殘年的老教授的命運固然可悲，可是在他被迫執筆竄改下的中國哲學的命運，豈不更加可悲！

在孔子哲學中，最受毛共攻擊的是中庸之道。今年一月四日「北京日報」刊登了由「北京大學」哲軍署名的文章，題目是「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對社會變革的哲學」。同月十三日「人民日報」在第二版予以轉載，此後毛共報刊都紛紛轉載，而其他文章中批判中庸之道的，也比皆是。

按朱子「中庸章句」題下註說：「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他又引：「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哲軍的文章，首先斷定中庸之道，「就是永遠保持舊的矛盾統一體，永遠保持舊質的穩定性」。而後曲解程朱的註解說：「按照中庸之道，事情如果超過舊質的一定的限度（「過」），或者達不到一定的限度（「不及」），都應該無條件地加以反對，只有「中」是最好的，因為把握住這個「中」，就不會走向極端，舊質的穩定性就不會受到破壞了」。

哲軍又引證「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認為，矛盾的統一、矛盾的對立的鬥爭是絕對的。事物的質的穩定性是相對的，事物由舊質向新質的飛躍是絕對的。事物的靜止是相對的，事物的運動是絕對的。辯證法承認事物的質的穩定性，但是反對把這種穩定性絕對化。辯證法認為，矛盾鬥爭的發展，突破了它的限度，必然要破壞舊質的穩定性，必然要引起舊統一體的破裂，引起矛盾的轉化，引起舊事物的死亡和新事物的產生」。

馬克思的辯證法，原本剽竊自黑格爾哲學。黑格爾認為每種事物都是由量與質來決定的，量與質是統一體（即度量）的兩面，度量便是量與質的綜合體。事物之數量的變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不引起質的變化；但數量的增減是有界限的，越過了這個界限，質量就起變化了。

哲軍的文章竊取此義，除了前引的一段文字外，並且說：「本來，一定的質都具有一定的界限，在這一一定的界限內，一定的質就能保持它的穩定性。但是，中庸之道却把這種一定的質的界限神聖化了，把舊質的穩定性絕對化

了。在這裏，它把舊事物說成是一種不可克服的力量，是神聖的、永恆的，「天不變，道亦不變」。

黑格爾所說的質量律，經共黨把它「唯物」化了之後，應該是指具體事物而言。把孔子的中庸之「道」，具體化為事物是否恰當呢？如果這樣做是可以的話，那麼自列寧以來，共黨就強調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所謂「右」傾機會主義應該是「不及」，所謂「左」傾機會主義就應該是「過」；不許「左」，不許「右」，難道那不就是「中」？不就是要求無過與不及之弊？共黨的「路線」，同樣是「神聖化」「絕對化」的呀，哲軍能夠讓它由量變引起質變嗎？把這個「路線」和中庸之「道」相提并論，也許是荒誕的。不過，這裏只是爲了證明哲軍的（嚴格說來是毛共）的觀點，本來就是荒誕的狡辯而已。

四

毛共「批孔」着眼點在一個「變」字，不變何以摧毀舊社會制度而建立馬列主義的共產制度？不變何以摧毀固有文化而建立以毛澤東思想爲中心的「新」文化？爲此，哲軍在文章中，特別引述「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詞句，而指「中庸之道是地地道道的保守派、反動派的哲學」。

在「批孔」過程中，毛共對「尊儒反法」也大肆抨擊。共黨認爲「在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是擁護沒落的奴隸主貴族統治的反動學派，法家是代表新興的地主階級利益的進步學派」⑧。共黨無愛於法家的階級成分，但它們認爲在當時法家是革新派而儒家是保守派，因而對前者給予較高的評價。羅思鼎的「秦王朝建立過程中復辟與反復辟的鬥爭——兼論儒法論爭的社會基礎」一文⑨，就充分反映了這一觀點。他的另一篇文章「從王安石變法看儒法論戰的演變——讀『王荊公年譜考略』」，把王安石評爲「是北宋時代一位比較進步的地主階級政治家」。文中特別推崇「王安石提出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⑩（「天象的變異不值得害怕，舊的傳統不能作爲依據，流言蜚語用不着去顧慮」）這三句話，和孔子所鼓吹的『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⑪（對天命要畏敬，對王公大人要畏敬，對聖人的言論要畏敬）直接相對立」⑫。和毛共報刊的其他文章一樣，羅思鼎在這篇

文章裏，也把少正卯說成是革新派。那麼殺少正卯的孔子，自然就是反對革新了。

前引哲軍那篇抨擊中庸之道的文章說：「作爲一種歷史觀，中庸之道就是把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築加以絕對化和神聖化，否定社會的革命變革，否定社會的前進運動，主張保守，主張復舊，主張倒退」。他說：「孔子處於奴隸制度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時期」。並誣指孔子的所謂「禮」就是「奴隸制度的規範」。「……孔子說的最高的『德』——中庸之道的要求，實質上就是要全面復辟西周奴隸制的等級制度」⑬。

根據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以階級觀點竄改歷史，乃是共黨的一貫作風。可是，中國歷史上是否有一個奴隸社會時代，如果有，它應該在什麼時候，在毛共黨內外的知識份子之間並沒有定論。例如周谷城的「中國通史」，就認爲中國歷史上容或有過奴隸存在，但如果說有一個奴隸社會或時代，就言過其實⑭。郭沫若過去把奴隸制和封建的界線畫在秦漢之交，到一九七二年他的「奴隸時代」的改版本中，把那條界線改畫在春秋戰國之間，而且在代序中說明那是受了毛澤東的影響。同年「紅旗」雜誌第十二期刊登的楊榮國「春秋戰國時期思想領域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從儒法論爭看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變革」的文章，斷定春秋戰國是由奴隸制度向封建制度過渡的時期。此後，毛共對中國歷史分期的說法才這樣趨於一致。然而，這只是由毛澤東所「欽定」，並非歷史事實本來如此。據而論列歷史人物，自然是荒謬絕倫的。而且，依照共黨的觀點，思想意識等上層建築，是隨着社會的經濟基礎的變更而變更的。所謂奴隸制、封建制等等，它們各代表着不同的生產關係。既然「秦國從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開始於秦孝公，完成於秦始皇，……秦始皇由於適應了封建制一定要代替奴隸制的社會發展趨勢，……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⑮。那麼孔子的時代就已成過去，他那「維護奴隸制度」的思想，自然是奴隸社會的上層建築，應該隨着生產關係的改變，即社會基礎的更迭而被揚棄了。又怎能像楊榮國在前述文章中說：「後來的剝削階級，不管是封建地主階級，還是資產階級，……一旦他們取得政權，成爲反動的統治階級却都要利用孔子的思想，來欺騙勞動人民，爲他們自己的反動統治服務。所以二千多年來，孔子一直被他們尊爲『至聖先師』」？尤有進者，共黨攫取政權二十有數年，還不能把「孔家店

「打倒。那豈不是說，孔子思想不會受到社會基礎變更的影響？那豈不是推翻了歷史唯物論的規律？」

不過，毛共批孔本來就不單是一場學術論爭，而共黨的歷史哲學也並不是什麼真理。因此，我們要注意的是去年十二月十三、十四日「光明日報」分兩天轉載馮友蘭的兩篇文章時所加的「編者按」，其中有一段說：「孔子是頑固地維護奴隸制度的反動思想家。幾千年來，他的反動思想，為古今中外反動階級所利用。劉少奇、林彪一類騙子也吹捧孔子，利用孔子思想為其反革命復辟陰謀服務。正因為這樣，深入開展批孔鬥爭，批判尊儒反法的觀點，是當前國內外階級鬥爭形勢發展的需要，是批林整風的一個重要內容，是上層建築領域內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項長期任務」。哲軍的文章，則指稱凡是鼓吹中庸之道的人，「就是為了維護他們的反動統治，維護舊制度、舊秩序、舊文化，反對革新，反對革命，反對社會的前進運動」。而「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叛徒、賣國賊林彪及其死黨陳伯達，同歷史上的反動剝削階級一樣，狂熱地鼓吹中庸之道。他們說：中庸之道是『合理』的，是『辯證思想』，『是我民族偉大的德性之一』。他們說：孔子的中庸之道，『對於我國後來辯證哲學的發展』，『有其很大的影響』，『這是孔子在中國哲學史上一個很大的功績』」。

這些文章透露給我們一個重要的消息，那就是儘管毛澤東掀起文化大革命，而他所自命為「革新」「革命」「前進」的一切事物，都在中國固有文化、孔子思想面前碰個粉碎，甚至他的捉刀人陳伯達和繼承人林彪，也受到固有文化的影響，這正是毛澤東要把文化革命繼續縱深發展、推進到第二段，並把批孔與批林結合在一起的真正原因，說它是失敗後絕望的孤注一擲，有何不可？

五

毛共「批孔」又結合着「揚秦」同時進行的，這似乎也是一事的兩面。

毛共「華中師範學院」歷史系學員陳陽風、李子林、梅倩等人寫作的「林彪為什麼咒罵秦始皇？」一文中，推許秦始皇說：「他崇尚法家，反對儒家，主張革新，反對復古，明令『以古非今者族』^⑩，對於不適應封建經濟

基礎的政治文化等上層建築堅決實行許多重大改革，是一個厚今薄古的專家」。這段話中除去「封建」二字，正是毛共今日所要作要為者，是其當前文化革命的基本走向，與我們前文的分析是相符的。

但是，下面的一段話才是更重要的：「秦始皇滅六國之後，果斷地採納了法家代表李斯的意見，實行有利於社會發展和國家統一的郡縣制，『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⑪，廢除了奴隸制時代遺留下來的『世卿世祿』制（即奴隸主貴族的世襲制）和『分土封侯』制（即分封諸侯的等級制），許多重要權力都集中在中央政權手中。這樣就鑷除了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從此『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⑫。這乃是這篇文章的重心，也是毛共當前政治鬥爭的中心目標。

毛共十個軍區的司令員，即使不能稱爲「世卿世祿」制，但至少有些「分土封侯」的味道。經過文革時期的「三支兩軍」過程，軍權陡然高漲，很多地方軍軍事首長，都兼任當地革命委員會的主任、副主任，地方黨部的第一、第二書記，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形成「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毛澤東當然急於想要「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把「許多重要權力都集中在中央政權手中」。林彪的被整肅，當與此有關。可是林彪這個「大黨閥、大軍閥」^⑬「粉身碎骨」之後，小黨閥、小軍閥依然存在。而且，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竟然株連到桃園三結義的關公，真令人懷疑到今日大陸，林彪的黨羽依然未能剷除。八個軍區司令員的調動，儘管可能有多重意義，但剷藩可能是其中的重要者之一。可是這一調，首先就把新建立好的革委會、黨委會扯亂了，又需要一個時間來重建。

就不說軍中還有林彪的死黨，但批林就等於整軍，對桀驁不馴的軍人提出警告。然而，從若干高級軍事頭目的空缺久久虛懸，和四居人大遲遲不能召開看來，毛共內部的權力分配迄今尚無法解決，是可以斷言的。

如果我們說，毛共是爲了批林而批孔，爲了剷藩而揚秦，就現階段而言，大致是不會錯誤的。可是批孔揚秦，會在中國人心中引起雙重反對。單就揚秦說罷，秦始皇建立的不是封建王朝，他是改封建爲郡縣，首次統一了中國。倘使「統一」是秦始皇的功勞，那焚書坑儒無論怎麼說都是他的暴政。秦始皇是滅了六個敵國而統一了天下，毛澤東是把一個統一的局面搞成四分五裂，想再統一而不可得。在功績方面他趕不上秦始皇，在焚書坑儒方面倒

超過秦始皇百倍（依毛自己的說法）。爲了鼓吹暴政，就不能不反對孔子的仁政，曲解孔子「那些『仁』、『德』」等一系列的思想，都是爲沒落的奴隸主階級服務」^{②1}。

孔孟之道，當前是在毛共政治鬥爭中遭到池魚之殃。例如爲了肯定林彪有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和復辟資本主義的野心，而據說他又鼓吹過「悠悠萬事，唯此爲大，克己復禮」，於是就誣指孔子的「克己復禮」，是復辟奴隸制的反動綱領；由於林彪攻擊過「五·七」道路，指責幹部下放勞動「等於變相失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就把罪過加在孟子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那兩句話的頭上；抨擊孔子和樊遲請學稼那段問答，和他「父母在不遠遊」的話，其作用也與前例相同。這些都顯示毛澤東的政策路線，樣樣碰壁，不得不繞彎子、找題目，藉打擊反對者來爲自己辯護。同理，把學生反對「走後門」而退學，當作一種運動來鼓吹，是顯示其教育革命行不通。從小學起鼓動學生反對尊師重道，顯示大陸教師絕大部分仍然是傳統的代表。毛共對 蔣總統的元旦文告發出叫罵，更顯示它對復興中華文化的號召是如何恐懼。

毛共說「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哲學，攻擊反修鬥爭『做絕了』，妄圖投降蘇修，把我國變爲蘇修社會主義的殖民地」^{②2}。毛共甚至還發表了「孔夫子在莫斯科」^{②3}，和「孔老二的亡靈和新沙皇的迷夢——評蘇修尊孔反法的卑劣表演」^{②4}等文章，那就簡直是把孔子思想當做對蘇鬥爭的犧牲品了。

「批孔」並非單純是學術或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鬥爭，而是有它的現實任務的。由上述種種看來，使我們認識到，儘管毛共不斷進行路線教育，但毛澤東的「革命路線」依然遭到懷疑；儘管「九大」「十大」一再肯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義，但很多人依然對它表示否定的態度；儘管毛共高喊反傳統和破舊立新，但傳統思想依然屹立不搖。而且，這些爲毛澤東所不願見的現象，竟然成爲主流、潮流，於他只好高喊「反潮流」，要「硬著頭皮頂住」。這項「反潮流」的重責大任，就交付給第二階段的文化革命來承擔。並把孔孟之道和資、修扯上關係，要一起來反。

六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而毛共的每一運動都是成套配當、全面展開的，那麼當前的文革新階段，是否會影響到毛共的笑臉外交呢？

首先我們說，毛蘇的鬥爭定然會尖銳化。其次，看到訪問過中國大陸的費城和維也納交響樂團受到抨擊，而且禍延到貝多芬和舒伯特等等；一九七二年以貴賓身份被毛共邀請到大陸拍攝「中國」紀錄片的安東尼奧尼被戴上「反革命份子」的帽子，他的紀錄片被指爲是「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親毛的左傾學者拉鐵摩爾被指爲是「反動的歷史學家」和「國際間諜」；布魯斯和黃鎮都被調回，美毛聯絡辦事處，暫由次級人員代理；再加上若干排外的表現，真會使人回憶起一九六〇年代的「造反外交」。不過，如果毛澤東還能有效控制羣衆，他將不願見在國際間完全孤立的形勢重現在眼前。只是，西方國家當不再認爲大陸已趨安定，更進一步與毛共加強關係。而毛共幹部也不敢對外人再以笑臉相迎，以免將來遭受整肅。這多少會暴露出毛共「畫皮」^{②5}後面的瘳惡面貌。

然則，被西方目爲「溫和派」的周恩來的命運又當如何？這似乎是大家所關心的。我們認爲，把文革的第二階段看成單純是對付周恩來，未免把大事看小。可是，這場運動必然結合着權力鬥爭，則勿庸置疑。對內對外，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帽子已經製成，難免有很多人要被這些帽子壓肅。只是「批林批孔」運動中，那個「林」字寫得太鮮明，這個「大黨閥、大軍閥」的影響未完全消除之前，或者說當前的「反潮流」鬥爭還沒有個初步結果，周恩來或許還可苟延殘喘。要是時間和情勢的發展有了必要，儘管他曾說過兵兵外交和邀請尼克森往訪，是毛澤東所決定；又儘管他在姿態上會及早見風轉舵，都不妨妨礙一頂白色帝國主義間諜的帽子戴在他頭上，那罪名並不比赤色帝國主義間諜更輕一些啊！

另一個問題是毛澤東真的會是永遠不倒的偶像嗎？不見得。事實是自從「三面紅旗」政策以來，毛澤東要維護他的地位與威信，就得把錯誤說成是正確的，把失敗說成是成功的，他已騎上虎背，必須向着「反潮流」的大道直奔到底。爲此，他一再發動文革，一再整肅繼承人。這朝三暮四的作法，

使得幹部們無所適從。前天捧劉(少奇)的，昨天成爲罪人；昨天捧反劉的林(彪)的，今天又成爲罪人！看到「三支兩軍」的槍桿子和「革命闖將」紅衛兵的下場，不反毛的也會暫時觀望。要是反毛份子不肯觀望，那局面就更糟了！

毛澤東在黨內會愈益孤立，在意識形態領域內，他既反中國文化，又反西方文化，甚至還排斥以蘇聯爲代表的共產文化！「獨夫」這兩個字，是當前毛澤東的最佳寫照。他真有那樣廣大的神通，把一切都反掉嗎？他自己的下場又如何呢？記得他有一首滿江紅詞，我們且把其上半闕抄錄在這裏，不看他自己重讀後會有何感想！詞如下：

「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

註釋

註①：馮友蘭此文原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七三年第四期，同年十二月三日「光明日報」與其另一文章「復古與反復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同時予以轉載，並加「編者按」。

註②：以上「」號內所引，俱見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人民日報」社論「把批林批孔的鬥爭進行到底」。

註③：見范文瀾著「中國通史簡編」。然持此見解的不止范文瀾，卽如郭沫若者，也有過類似的評價。

註④：該報告標題爲「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收入「毛選」二卷，所引見五二二頁。

註⑤：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毛澤東在毛共「八大」二次會議中的講話。

註⑥：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春節談話紀要」，毛共版「毛澤東思想萬歲」第二冊，四五九、四六二—四六三頁。

註⑦：同年八月十八日「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前引書五五〇頁。

註⑧：石命「論尊儒反法」，原載「紅旗」雜誌一九七三年第十期。

註⑨：原載「紅旗」雜誌一九七三年第十一期。

註⑩：文中原註：「宋史，王安石傳」(四部備要本第二七六頁)。

註⑪：文中原註：「論語，季氏」。

註⑫：該文原載「紅旗」雜誌一九七四年第二期。「王荆公年譜考略」爲清代蔡上翔所著。

註⑬：這並非哲學的個人觀點，自從一九七三年八月七日「人民日報」發表楊榮國的「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度的思想家」一文後，毛共報刊的批孔文章，都持此一論調。

註⑭：周谷城「中國通史」出版於一九三九年，開明書店版。大陸淪陷後，他被迫稍稍改變其觀點。

註⑮：同註⑯所載羅思鼎「秦王朝建立過程中復辟與反復辟的鬥爭——兼論儒法論爭的社會基礎」。

註⑯：文中原註：「史記，秦始皇本紀」。

註⑰：全右。

註⑱：該文原載「紅旗」雜誌一九七三年第十二期。

註⑲：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人民日報」社論「把批林批孔的鬥爭進行到底」一文中的林彪罪名。

註⑳：同年二月三日香港「大公報」載「馮友蘭談從魯孔到批孔」。

註㉑：同註⑳。

註㉒：作者康立，原載「紅旗」雜誌一九七四年第一期。

註㉓：作者「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原載「北京日報」，「人民日報」予以修正轉載。

註㉔：蒲松齡著「聊齋誌異」有「畫皮」故事。一獍鬼披彩繪人皮而化妝美女。

蘇聯五十年

V·史料羅杜莫夫著

呂律譯

·實售二十元·